

# 论北宋王朝对蜀人的疑忌与选派入蜀士人之特殊性

伍联群

摘要：巴蜀地域有险峻封闭的地理形势，富饶自足的物产资源，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具有无可比拟之战略地位。加之历代皆有豪杰割据巴蜀并从而据有天下，使得统治者不得不以蜀地为诫。赵宋政权北征的彻底失败，形成与辽、金、夏等政权的鼎分之势。宋统治者放弃了对北方政权吞并合一的政治军事梦想，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把统治重点放在对内的防范和控制之上。巴蜀地域的安定，就成为赵宋政权维持其统治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对巴蜀地域的治理就异于其他州府，尤其表现在对入蜀士人的选派上。一方面，入蜀官员既要有忠厚之品性，同时也要具有干练之文武才能。这些入蜀士人皆成为赵宋中央之重臣。北宋朝廷通过选任入蜀官员，既加强了对巴蜀地域的控制，也进一步将地域文化整合到国家大一统文化之中。

关键词：巴蜀地域；入蜀士人；疑忌；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2)02-0082-07

公元965年，西蜀孟昶在赵宋大军的强势攻伐之下，不得不“上表请降”，巴蜀地域由此成为赵宋疆域版图之一部分。北宋的建立标志着晚唐五代以来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在所谓中原王朝的意义上实现了统一。但从政治地缘学观之，宋朝先后与辽、金、夏成鼎分之势，并未能一统天下。雍熙北征失败之后，宋朝统治者彻底放弃了对北方政权吞并合一的政治军事梦想，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并把统治的重点放在对内的防范和控制上。这种统治政策的转变，使得巴蜀地域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巴蜀地域的安定与否，成为赵宋政权维持其稳定统治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对巴蜀地域的治理也就明显不同于其他州府，这尤其表现在对入蜀官员的选择之上。本文试就此略论之。

## 一、巴蜀地域之战略地位

巴蜀地域以其险峻封闭的地理形势和富饶自足

的经济条件成为“各挟智力，擅为封疆，自制位号，以争长雄”的豪杰觊觎争夺之地。巴蜀号称“天下绝险”之地，“龙州、松潘镇其北，播州诸夷列其南，天全、黎州当其西，瞿塘守其东，江山四塞，关峡孤开，可守一当百。”不仅如此，且有“岷峨为望，犍泝为障，峻陲巨防”，“重险积货”。其北有巴山秦岭屏障，剑门之险：“蜀地与秦同域，剑阁之险过于潼关，蜀所恃为外户。”南有云贵高原拱卫，有“控扼六诏”之重镇泸州，西有青藏高原之扼，抗峨眉重险之双流，东有三峡险峰重叠，有控荆楚上游之夔州，其地理形势“蜿蜒龙蟠，西峙岷岭，东阻夔门，来关霄倚，剑阁云盘”，崖谷峻绝，十里百折，“是称金城”。因此，只要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78《南唐李氏》，中华书局，1977年，第13853页。

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卷43，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57页。

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4，王曦《吴武陵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朱鹤龄撰《禹贡长笺》卷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应麟撰《玉海》卷19“泸州”：“控扼六诏为重镇，西连楚道，东接巴渝，古巴子之国。枕带双流，地兼夷汉，江带梓夔，地联戎楚，境接巴黔。地控云南之六诏，疆连井络之三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四川通志》卷首郭棐序。明章潢撰《图书编》卷40“四

收稿日期：2011-10-18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2010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0YJA751091

作者简介：伍联群(1969-)，女，四川简阳人。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据其险要关隘，即可自为一独立王国。殷周时之巴蜀，就依仗其重险关阻，不臣于天子：“及夏殷之际，梁俗变为蛮夷，贡职不修，贡道遂废。周武王牧野之师，八国虽尝来会，其后巴蜀恃险，复不与中国通。”其后，巴蜀之地更是“多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与中原相抗衡。巴蜀地域这种相对封闭、自成一国的战略优势，使它成为历来豪杰英雄争夺天下的王霸之基：“蜀之为国，岩僻而固，有天下者所必争也。汉高祖起南郑，举兵而东，收三秦如破竹，不数年间，遂成帝业，而以蜀汉之地为关辅，心腹不以封建，盖其敛迹垂翅，有以窥天下之变。”李文子总结历史之成败云：“三代以来，秦得蜀以并诸侯，汉高由蜀汉以定三秦，诸葛亮三分天下，仅有一而伸大义於季汉，非以其地，西接崑函，南连荆吴，扼关河之胜，则为天府之固，合吴蜀之长，则据上流之重险要，虽控制一隅而形胜实关于天下欤！”秦朝得以兼并六国统一天下，汉高祖数年之间成就帝业，诸葛亮申张大义于汉季，皆是首先据有巴蜀之地，然后得以窥视天下。因有历史成功之先例，故而宋太祖“肇造区夏”，也即攻取天下之策略，“先取荆南，以通入蜀之路，继取全蜀，以图混一之功”，也是以巴蜀地域作为争夺天下的基础。

巴蜀地域有重山阻隔，江河环绕，僻处西南奥区，道远万里，往往“三月而不达”，呼叫难闻。

川图叙：“四川，古梁州地。剑阁表云栈之固，瞿塘锁巴峡之流。界以番族，阻以蛮部，山水襟属，自相藩篱，故奸雄割据，则盗兵不敢西窥。地饶而险阨备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胡渭撰《禹贡锥指》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96页。

陈寿撰《三国志》卷41《霍峻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008页。

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4，王曦《吴武陵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曹学佺撰《蜀中广记》卷93“郭允蹈蜀鑑一卷”李文子序。《史记》卷97：“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97页。《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12页。

袁燮撰《絜斋集》卷4《论蜀割子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晋书》卷2：“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中华书局，1974年，第38页。

杨士奇等撰《历代名臣奏议》卷100，吴昌裔《又论救蜀

宋人袁燮论蜀地之形势云：“盖此一方，去天万里，安危休戚，艰于上达。形势何以联属，警急何以赴援，非其他诸路比也”，并认为“天下安危实系乎此。重此一方，所以重国势也”。当时之人亦云：“若必欲见中兴恢复之功，则非处巴蜀，恃三峡之天险，用陆路之壮士则不可也。”此论可谓洞悉巴蜀地域独特之战略局势，当其之时，据有巴蜀，则国存；失之，则国亡。明人亦云：“蜀安而邻省皆保，蜀存而常赋自充，安危得失所系。”巴蜀之安稳，关乎天下之安危得失。巴蜀地域不仅是争夺天下的关键，也是维持天下的基础。这当然是以巴蜀地域之险峻的地理形势和丰富的物质资源为其前提。

巴蜀之地不仅地势险要，其山水襟属，自相藩篱，有攻守之固，更为重要的是其资源之富饶，号称“天府”：“蜀为天府之地。诸葛亮为昭烈告之矣。其言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夫险塞则可以守，沃野则可以出军需。亮盖得策矣。是建邦启土之始也”。诸葛亮就是占据巴蜀地域的地理优势和富饶的资源才得以建邦立国。诸葛之前，尚有汉高祖刘邦，“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食”。宋人则对此明言汉高祖是取巴蜀之资从而得到天下：“巴蜀江淮自昔号为富饶。汉高东向争天下，独命萧何留取巴蜀以给军，是以巴蜀之资取天下也。”其后，有后唐庄宗，高季兴对庄宗言：“蜀国地富民饶，获之可建大利”。据史书载，后唐攻下蜀地，得到兵30万，马9500匹，兵器700万，粮250万石，钱192万缗，金银22万两，珠玉犀象2万，文锦绫罗50万匹。一时之间，后唐国势大盛，威震

四事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袁燮撰《絜斋集》卷4《论蜀割子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卷123，“马政应诏上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03页。宋熊克撰《中兴小纪》卷21：“都官郎中冯康国言：今天付吴蜀于陛下，为中兴之基。”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49页。

《御选明臣奏议》卷36朱燮元《请发帑金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章潢撰《图书编》卷40“水利蚕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85年，第30页。

章如愚编《群书考索续集》卷46，“江淮巴蜀财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羽翀撰《三楚新录》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郭允蹈撰《蜀鉴》卷7，丛书集成本，第102-103页。

群雄。取巴蜀之财富资以军用，从而据有天下，这是历代争夺巴蜀的重要原因。“盖自春秋战国以来至于宋朝之兴，垂千有七百年，而南北交争余九百载。而北人能并南者有四，大率皆先得四川。故秦惠王并蜀而始皇因以灭楚，晋文帝并蜀而武帝因以灭吴，周文帝并蜀而隋文帝因以灭陈，及宋之兴，亦乾德中并蜀而开宝中遂平江南。”宋太祖攻伐巴蜀之目的，亦无非是将其作为财政之府库。据史载，“蜀地饶富，孟氏割据，府库益以充溢。及王师平蜀，孟氏所储悉归内府，而言事者竞起功利。”

又“孟氏割据，府库充溢，及王师平蜀，其重货铜布载自三峡，轻货绞縠即设传置，发卒负担，每四十卒为一纲，号为日进。不数十年，孟氏所储，悉归内府。”正是宋太祖夺取了巴蜀之财富，才得以荡平江南各地之割据势力。

由于巴蜀地域如此之战略形势，所以一旦王权衰弱，巴蜀之地就会首先发难，从而引起天下动荡。前人对此早有明断：“然山川设险，非亲勿居。且蜀土沃饶，人物殷阜，西通邛、樊，南属荆、巫。周德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地便为祸先。是以明者防于无形，治者制其未乱，方可庆隆万世。”所以治理巴蜀，须要防患于未然。

巴蜀之地既被视为王业之基，天下安危之所系，故而历代中央王朝皆较为重视治蜀官员之人选，尤其是晚唐五代之际，王建和孟知祥先后称雄巴蜀，建立前蜀后蜀政权，格外引起经历过藩镇军阀割据之乱而建立起来的北宋政权之疑忌，因而在入蜀人员的选择方面尤为慎重。

## 二、宋代统治者对蜀人的疑忌与防范

章如愚编《群书考索续集》卷47，“川陕六路”，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国初，贡赋悉入左藏库。及取荆湖，下西蜀，储积充羨。上顾左右，曰：‘军旅饥馑，当豫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乃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以贮金帛，号曰‘封樁库’。凡岁终用度赢余之数，皆入焉。别置库，本志及他书皆云在乾德初，未审何年。计必是平西川后也。因命诸州不得占留金帛，附见其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52页。

陈均撰《九朝编年备要》卷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彭百川撰《太平治迹统类》卷3，“太宗平李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魏征等撰《隋书》卷39，《于宣敏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147页。

从汉代开始，蜀人就被认为其性“轻易淫佚，柔弱褊阼”，晋代张载则说“蜀人恃险好乱”，“世浊则逆，道清斯顺”。此后，“蜀人乐祸贪乱”，“蜀土习乱”，“蜀人性善柔，自古称兵背叛”云云，似乎蜀人特别喜欢犯上作乱，不易顺服。在隋之前，则有“刘备资之，以成三分之业”，而后“李氏据之于前，谯氏依之于后。当梁氏将亡，武陵凭险而取败。后周之末，王谦负固而速祸。”在宋初数十年的时间里，“李顺之党方息而刘旻兴，刘旻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以至使人慨叹“何蜀人之好乱耶”！巴蜀之地真是祸乱不已，使得后来者不得不以蜀人为诫焉。尤其到晚唐五代之时，王建孟知祥先后据蜀自立，自此之后，蜀人更受猜疑。

为了阻闲防扼，削弱蜀中地方势力，统治者首先采取了强制移民的举措。后唐明宗就曾经强令蜀地“凡高赀有力者”全部东徙。<sup>①</sup>宋太祖征服后蜀孟昶攻占巴蜀之后，也大量迁徙巴蜀士民出蜀。“乾德三年春，王师平蜀，诏昶举族赴阙，赐甲第於京师，迨其臣下赐赉甚厚。”<sup>②</sup>“又诏伪蜀文武官并遣赴阙”，如此，“孟昶与其官属皆挈族归朝，由峡江而下。”<sup>③</sup>后蜀孟氏及其文武百官全部被迫移居京师。此外，凡是蜀中有赀财者也不得居蜀：“蜀平，……蜀之富人皆召至京师，量其材为三等。其上官之，次省员，下押纲。人安其居，不愿东，以疾归，后复遣。如是数四，不使家居也。”<sup>④</sup>因此，为了防范蜀人，“苟可以防闲阻遏，无不为矣。”

①

班固撰《汉书》卷28下，第1645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55《张载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516页。

李延寿撰《南史》卷55《罗研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369页。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47，《席旦传》，第11016页。

魏征等撰《隋书》，第830页。

②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卷2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杨慎编《全蜀艺文志》卷30，宋张唐英《蜀檮杌序》：“洎知祥入蜀之后，明宗颇以蜀人为疑，凡高赀有力者尽令东徙。”线装书局，2003年，第787页。

④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13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30页。

⑤李焘编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第149、150页。

⑥陈师道撰《后山谈丛》卷3，中华书局，2007年，第46页。

⑦唐庚撰《眉山唐先生文集》卷7，《辩蜀论》，四部丛刊三编，第64册。

为达到对蜀人的防范之目的，除采取移民之举外，对蜀人的任职也有明确限定。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特放诏令：“西蜀、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转运使及诸事任。”

对蜀人不能在本地为官作出明确规定。后来随着赵宋统治的巩固，选任官员的地区回避有所放宽，但朝廷对巴蜀地域的任官仍然有特殊规定。从宋神宗熙宁年间针对巴蜀地域的官员选任连续发出的诏令可窥知其对蜀人仍然心存疑忌：

熙宁八年（1075）诏：川峡四路知州、通判、四路人差授，不得以本路人为代。

熙宁十年二月诏：自成都府、梓、利、夔州路知州、通判，不得并差川峡人。

熙宁十年三月诏：自今川峡四路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官，不得兼差川峡人。

直到北宋末年，对巴蜀地域之官员的选人政策仍未改变：“诏四川郡守并选内地人任之。”即使任用蜀人担任本地官员，也是有特别的规定：“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考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北宋年间任成都府等四路兵马都钤辖、知益州成都府的，全无蜀人。由此种种，可以见出，在北宋时期，赵宋中央朝廷对蜀人的严格防范和疑忌，而对巴蜀地域的治理和控制也异于他路。统治者所担心者，不外乎“蜀世有货泉储蓄为用”，使得“奸宄内作，悬车束马，势不相及，有难猝定者矣”，因此让“权臣因而据有”，造成王纲不振。

实际上，历史上巴蜀地域之乱，也不尽为蜀人所为。宋代张不立就为之辩解道：“蜀中之叛，非蜀人为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为也。”此言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3，第 531 页。

李焘编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64、卷 280、卷 281，第 6481、6869、6882 页。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 20，第 382 页。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 298，《陈希亮传》，第 9918 页。

《四川通志》卷 44，张愈《送张安道赴成都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561 册，第 505 页。

章潢撰《图书编》卷 40，“四川图叙”、“择守令”，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欧阳忞《舆地广记》卷 1 云：“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公孙述、刘备、李雄、义纵迭据之，皆因中原多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5 页。

杨慎编《全蜀艺文志》卷 30，宋张唐英《蜀檮杌序》：“洎知祥入蜀之后，明宗颇以蜀人为疑，凡高赏有力者尽

可谓切中肯綮。因此赵宋朝廷除了保持对蜀人的戒惧之外，对入蜀官员的选任也是极为谨慎和重视。宋初赵昌言入蜀中途而止的事件可为宋朝廷对巴蜀地域之疑忌和对入蜀官员之防范和阻遏之一斑做显证：

先是有峨眉山僧茂贞者，以术得幸。尝言于上曰：赵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于是昌言行既旬余，或又奏昌言素负重名，又无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后难制。上亟幸北苑，召宰相谓曰：“昨遣昌言入蜀，朕徐思之，有所未便。盖蜀贼小丑，昌言大臣，不可轻动。宜令且驻凤翔，为诸军声援。但遣内侍押班卫绍钦赍手书往指挥军事，亦可济矣”。昌言已至凤州，诏追及之，因留候馆。

因为有对赵昌言的一点风闻之词，于是宋太宗就立刻中止赵昌言入蜀。虽然理由说得非常美妙动听：“蜀贼小丑，昌言大臣，不可轻动”，也就是说“杀鸡焉用牛刀”，但实际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赵昌言“今握兵入蜀，恐后难制”。宋太宗置蜀中紧急军情之不顾，中途换人，其对入蜀官吏疑忌之心由此可知。宋初朝廷不仅对巴蜀地域的高级地方官员选任比较慎重，就是对一些比较低级的地方官吏的选任也很谨慎。曹彦约记载张咏欲移地方知县而为朝廷驳回之事，足以说明当时朝廷对巴蜀地方各级官员任免的控制：

益州张咏上言所部知县三人，欲以他官对易之。上曰：“任官之道，各有所宜。蜀民轻浮，好为游乐。官吏政宽，能与之浮沉，民即便安，若稍执纲纪，动即怨怼。朕每命一官，无非慎选。咏之所奏，未可许也。”

对于张咏所请，朝廷以所谓“任官之道”的冠冕堂皇之理由断然拒绝，但是对于同是属于险远之地的岭南州县官员，朝廷却以“习其风土”同意当地人

令东徙。”线装书局，2003 年，第 787 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6，第 796 页。关于赵昌言入蜀中途被罢，何冠环先生认为是朋党斗争之故。见何冠环著《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 年，第 36 页。

曹彦约撰《经幄管见》卷 3，丛书集成续编本，第 27 册，第 961 页下。

员充替之。朝廷出于“任官之道”和“蜀民轻浮”而慎选蜀地地方知县，如此举措尚有情理可因，那么对于朝廷官员与入蜀人员的信件来往也颇为关注，则似乎显得异乎寻常了：“张咏自益州寄书与杨大年，进奏院监官窃计之，云：‘益州近经寇乱，大臣密书相遗，恐累我。’发视之，无它语，纸尾批云：‘近日白超用事否？’乃缴奏之。真宗初亦讶之，以示寇准。准微笑曰：‘臣知开封府有伍伯，姓白，能用杖。都下但翹楚者，以白超目之。每饮席，浮大觥，遂以为况。’真宗方悟而笑。”此事虽以喜剧结束，但朝廷对巴蜀地域之严密监控，以及对入蜀人员的严重疑忌使得朝廷大臣不得不为摆脱嫌疑表明清白而向皇帝呈递所收书信。凡此种种，皆可窥知赵宋朝廷对巴蜀地域的治理和控制的确有异于其他州路。这就形成了北宋入蜀官吏独特的时代特性。

### 三、宋代入蜀士人之特殊性

宋太祖立国之时，鉴于五代武人拥兵自重之形势而采取了佑文抑武之治国策略，此后一直被其后继者严格承续执行。这使整个有宋一代形成主要以文官为主体的官僚体系和行政机构。入蜀官吏也以文人为其主体。

因为对蜀人和入蜀官吏的疑忌，赵宋朝廷对于巴蜀地域之治理异于中原。宋人有诗云：“国初以来治蜀者，处置尽自乖崖公。当时奏使便宜敕，不与天下州府同。”治蜀之重要性和特别性，宋人深切感受之。正是巴蜀地域之特殊性，所以，自宋初开始，对于入蜀州府官吏朝廷就有特别之恩宠：“维蜀万里，在天一方，自昔祖宗之时，已隆牧守之寄。当其临遣，必有以宠其行。越既劳还，必有

以旌其最。”李应机的宦蜀可为代表性之例证：

李应机者，尝知咸平县。上以寿王尹开封，遣散从以帖下县，有所追捕。散从恃王势，謾譟于县庭。应机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从走归，具道其语，泣诉于王。王不答，而默记其名，嘉其谅直。及即位，擢应机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谓曰：“朕方以西蜀为忧，故除卿此官。此未足为大任也。卿第行勉之，有便宜事，密疏以闻。”

应机至州，未几，有走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置酒饯之，应机故称疾不会，走马心已不平。及暮，应机使人谓走马曰：“应机有密疏，欲附走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马不知其受上旨，愈怒，强应曰：“诺。”明日，使人请应机，曰：“某治装已具且行矣，愿得所赍之疏。”应机曰：“应机疏不可与人传也，当自来受之。”走马虽怒甚，意欲积其骄横之状具奏于上，乃诣应机廨舍受其疏以行。既至升殿，上迎问曰：“李应机无恙乎？有疏来否？”走马愕然失据，即对曰：“有。”因探其怀出之。上周览，称善数四，因问应机在蜀治行如何。走马踖踖转辞，更称誉之。上曰：“汝还语李应机，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见尽当以闻，蜀中无事，行召卿矣。”顷之，召入迁擢，数岁中至显官。

李应机以干敏之才受到宋真宗的重视而委以益州通判重任，临行升殿亲自诏对，此后迅速得到擢迁而至显官。出任蜀地州府之官员，临行之时，皇帝都要亲自诏对，加以劝戒，授之便宜从事。任满之时，皇帝也要面询巴蜀事宜，亲加慰勉，加以擢用。此例在北宋一代不胜枚举，此不赘述。

因为入蜀官员有较大的自主权力，因此，其人选之品德和才干至关重要。这也使宋代皇帝极感其人才难得。宋太宗曾感叹得治蜀者之难：“宽则育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95：“六月甲申，右谏议大夫李应机言，岭南惠州河源、韶州翁源、循州兴宁锡场、梅州管界县分，属岚瘴多处，其令佐及梅州知州、监押，望并用广南人充，所冀习其风土，从之。”第 2195 页。而蜀人要在本土为官，似乎极为罕见。故李石有诗云“喜闻谋帅用乡士，乖崖以来无此奇”，偶尔对蜀人的招用，就使人不得不大感惊异了。见宋李石撰《方舟集》卷 2《次张益州芝草十二韵》。

孔平仲撰《谈苑》卷 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元竑撰《杜诗攷》卷 2，“蜀地偏一隅，易治易乱，治之者稍异中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强至撰《祠部集》卷 3，《送知府吴龙图》，亦见于文同撰《丹渊集》卷 12《送知府吴龙图》。

刘燊撰《云庄集》卷 9，《赐宝谟阁直学士朝议大夫前知成都府路安抚使黄嚆若辞免除尚书兼太子右庶子恩命不允》，亦见于真德秀撰《西山文集》卷 22，《赐宝谟阁直学士朝议大夫前知成都府路安抚使黄嚆若辞免除兵部尚书兼太子右庶子恩命不允诏》。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1，第 864 页。亦见于司马光《涑水记闻》卷 7。

奸，猛则残俗，得夫济者，实难其人。”宋仁宗时，在选派入蜀官员的问题上，仍持如此看法：

至和元年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边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天子曰：“毋养乱，无助变。众言朋兴，朕志自定，外乱不作，变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惟朕一二大吏。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其命往抚朕师。”乃惟曰张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

宋仁宗认为治理蜀地既不能宽纵，以免“养乱”；又不能暴掠而“助变”，其官员需要有“能处兹文武之间”的能力，而具备这样才能的人，也只有“一二大吏”而已。宋神宗也曾经就选派巴蜀地域官员的人选发表看法：

今海内之蕃域号为至重者，举莫若吾之全蜀。壤土衍沃，民俗丰夥。外之，则八国种落赖以绥辑；内之，则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得人而重，固异他所。须智略沈辩，威惠肃给，厌舆论之所与，慰遐氓之所欲者，始为其人矣。

宋神宗认为，全蜀（主要是指成都府路）起着镇抚西南夷的重要作用，是稳定宋代在西南地域的重镇，再加上其资源丰富，极易形成割据独立的局面，因此选任官员非常重要。蜀人张愈在《送张安道赴成都序》中亦说：“蜀之顺逆，系中国盛衰也。”此话虽然不免夸张，但也说明，如果巴蜀地域不稳定，对赵宋的统治将构成极大的威胁，造成全国局势的动荡。一方面，巴蜀地域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了朝廷对其入蜀人员的重视。另一方面，在宋代，还形成一个惯例，即“近臣还自成都者，将大用，必更省府”，凡出守西蜀之地者“有大用之渐”，高

张咏撰《张乖崖集》卷2，《悼蜀四十韵并序》，张其凡整理，中华书局，2000年，第7页。

苏洵撰《嘉祐集笺注》卷15，《张益州画像记》，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94页。文同撰《丹渊集》卷26，《送赵大资再任成都府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6册，第708页。

《四川通志》卷44，张愈《送张安道赴成都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61册，第505页。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16，《赵抃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23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2，哲宗元祐二年：“西蜀，天下之大镇，事权委寄，素号雄重，出守者有大用之渐。”

崇文更是称之为“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即镇抚西南者定为“重任之臣”。如程戡再守蜀之时，皇帝许其还时“当置之二府。”赵抃从成都而还，初为谏官不入省府而引起大臣议论，皇帝亲自解释，不久之后就被擢为参知政事。西蜀之地已经被视为出任宰相之前的历练场。其人选之重要与慎重，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巴蜀地域的稳定关系着天下的安定和赵宋统治的稳固，同时蜀地官员也是此后进入重要权力机关的后备人选，所以选派之人员定当“固异他所”。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担当治蜀守蜀之重任呢？对此，宋人多有议论。许驥说：“蜀民浮窳易摇，宜择忠厚者抚之，为备预。”张嶠说：“川蜀系国利害，非腹心之臣不可。”<sup>①</sup>欧阳忞亦云：“一方之寄，非亲贤勿居。”<sup>②</sup>也即入蜀官员的首要条件是要个性忠厚，且必须是深得皇帝信任的腹心之臣。如吕余庆“重厚简易”，“时称其长者”，<sup>③</sup>辛仲甫“器局沉厚”，<sup>④</sup>赵抃“长厚清修”，<sup>⑤</sup>田况“举贤良方正”，明镐有“忠亮”之称，<sup>⑥</sup>许驥

第9794页。

王应麟撰《玉海》卷1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3，“丁丑，枢密直学士、给事中程戡为端明殿学士知益州。初，孟知祥据蜀，李顺起为盗，岁皆在甲午。或言明年甲午，蜀且有变，上谓宰相庞籍曰：‘朕择重任之臣以镇抚西南，莫如戡者。’遂再使守蜀，且谓籍：‘戡还，当置之二府，可预告之。’”第4182页。

《宋史》卷316，《赵抃传》：“赵抃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谏院。故事，近臣还自成都者将大用，必更省府，不为谏官，大臣以为疑。帝曰：‘吾赖其言耳，苟欲用之，无伤也。’…未几，擢参知政事。”第10323页。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77，《许驥传》，第9436页。

①[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45，《张嶠传》，第13139页。

②欧阳忞《舆地广记》卷1云：“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公孙述、刘备、李雄、义纵迭据之，皆因中原多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③[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63，《吕余庆传》：“自太祖继领藩镇，余庆为元僚。及受禅，赵普、李处耘皆先进用，余庆恬不为意。未几，处耘黜守淄州，余庆自江陵还，太祖委曲问处耘事，余庆以理辨释，上以为实，遂命参知政事。会赵普忤旨，左右争倾普，余庆独辨明之，太祖意稍解，时称其长者。”第9099页。

④[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66，《辛仲甫传》，第9178页。

⑤[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16，《赵抃传》，第10325页。

⑥[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92，《明镐传》《田况传》，第9770、9778页。

以“儒厚长者”称，牛冕被许为“纯善”，蒋堂“清修纯飭”，凌策“性淳质和”，等等。其次，除了品德忠厚、深得皇帝倚重信任之外，入蜀官员还必须敏于政事，具有文武才略。如马亮，“有智略，敏于政事”，辛仲甫“能吏事”，被称许为有文武兼备之才。要求所选之人须具备文武双全的才能，“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须智略沈辩，威惠肃给”，就是要求治蜀官员要有较高的政治技巧和很强的行政能力，既刚正威严，也仁慈恩惠。袁燮说：“有才而无识者，不足以为蜀帅。有勇而无谋者，亦不足以为蜀帅。”这正是宋代对入蜀官员个人能力的特殊要求。入蜀官员的选定，都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要求，如果只具备一点，都很难被朝廷派遣入蜀。

如果只具备较强的才干但缺乏忠厚的品性，则不会被选任蜀地官员。如范祖禹在《论李之纯蔡京札子》中曾讨论李之纯、蔡京谁入蜀更合适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宋朝廷对入蜀官员选派条件之侧重。全文不长，兹录于后：

臣伏闻知成都府李之纯除户部侍郎，知瀛州蔡京除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臣窃以成都兼两路钤辖，方面之任最为要重。祖宗以来尤慎付与。闻之纯宽厚简静，蜀人安之，宜且令终任，或增秩再任。今户部虽欲得人，而远方数千里，休戚安危所系，亦不为轻。蔡京素附会奸臣蔡确，众所共知。虽有才能而年少轻锐，非端厚之士。又故事，自成都回者，多为执政。其次犹为三司使，知开封府。朝廷方当分别邪

正。如京者，在所裁抑，不宜崇长。今进职远帅，则资任愈隆，为他日大用之渐，实未允惬。伏望且令依旧。如必欲召用之纯，乞别择人付以远方，取进止。二十日批出未得施行，二十四日蔡京改江淮发运使，李之纯候任满，取旨再任。

范祖禹认为蔡京不能被派任知成都府，原因有两个：一是蔡京“附会奸臣”，“虽有才能而年少轻锐，非端厚之士”，品德上有缺点，二是因为任职成都的文人回京后多成为执政，升迁为朝廷的重要大臣，执掌重权，如果蔡京知成都后，将会有此升任，而对蔡京却不能付以重任，反而应该对其加以抑制。范祖禹的札子上呈后不久，蔡京改江淮发运使，李之纯再任成都。此番议论，如果排除范祖禹和蔡京在政治上的争斗因素，可以见出宋朝廷对选派的入蜀官员，在才与德二者之间，更倾向于后者。牛冕之任职成都，更可为此点之有力证明。牛冕虽然被认为“非抚御才”，没有能力“绥辑”巴蜀地域，但仍取代张咏而宦蜀，其中最重要之原因，定是他具有“纯善”忠厚之品德而已。

方孝孺说：“蜀之形势，天下之险，莫先焉。”确然，巴蜀地域夷汉杂处，气习靡淳，地理辽邈，僻远多阻挡，但有富饶之资源，且蕃蔽吴楚，东南上游，表里滇陇，为西南之要地，“得其人则治以安，否则亦易扰乱。前代之往辙，炯鉴具在也。”故而治蜀者，皆须“廉能将相之器”方能抚御之，一旦选任不当，则起祸乱。被皇帝视为“重任之臣”而选派入蜀的宋代文人官吏，不仅为巴蜀地域的稳定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巴蜀地域与中央王朝在政治和文化的积极整合过程中，入蜀文人与有力焉。

（责任编辑：黄云鹤）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77，《许驤传》《牛冕传》，第9436、9440页。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98，《蒋堂传》，第9913页。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07，《凌策传》，第10129页。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98，《马亮传》，第9917页。

《宋史》卷266，《辛仲甫》传：“仲甫少好学，及长，能吏事。伟姿仪，器局沉厚。”“太祖问群臣文武兼资者为谁，赵普以仲甫对。徙益州兵马都监。代还，选为三司户部判官。”第9178、9179页

杨士奇等撰《历代名臣奏议》卷97，“袁燮论蜀奏”，四库全书本，第435册，第724页下。宋吕中撰《宋大事记讲义》卷七亦云：“李顺之党方息，而刘旰兴；刘旰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乱耶？盖其民勇悍，而又狃于僭伪之久，故易诱以乱耳。然安李顺之党者，张忠定也；平刘旰之乱者，亦张忠定也。代以朱冕则王均反，牧守其可非人乎？”吕中之论可以为袁燮论之注脚。

范祖禹撰《范太史集》卷1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0册，第212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真宗咸平三年”：“初，张咏自蜀还，闻冕代已，咏曰：‘冕非抚众才，其能绥辑乎？’既而果然。”第1014页。宋赵善璵撰《自警编》卷8：“初，张忠定公自蜀还也，诏以谏议大夫牛冕代公。公闻之曰：‘冕非抚御才，其能绥辑乎？’始踰年，果致神卫大校王均之乱，逐冕据益州。”

郭允蹈撰《蜀鉴》方孝孺序，丛书集成本，第1页。

章潢撰《图书编》卷40，“四川图叙”、“择守令”，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